

伊拉克战后重建中的政党政治发展

汪 波

内容提要 伊拉克战后重建中的政党政治发展, 主要体现为伊拉克不同种族和宗派政治势力的扩大与冲突。为适应战后所谓“民主化政治重建”的需要, 各种族和宗派势力都积极建立政党, 通过参与选举来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但面对战后现实的政治环境, 各政党须靠建立民兵武装维护和扩大势力范围。同时, 政党还通过提供就业机会和其他物质利益吸引支持者。这种集政治、军事和经济为一体的政党政治发展, 会进一步加深伊拉克种族和宗派势力之间的分化, 削弱国家的中央权力, 对伊拉克未来的国家建立和政治发展造成深远影响。

关键词 伊拉克 政治重建 政党政治

作者简介 汪波,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 200083)。

在伊拉克战后的国内政治重建中, 政党政治发展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伊拉克战争结束后, 面对缺乏建构民主政府所必须的政治妥协和政治联合的现实, 国内各种族和宗教派别只能在美英联军临时权力机构提供的有限政治自由基础上, 通过发展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党政治来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 并为其所属的民众参与地方政治和发表政治主张提供一条基本的途径。由于伊拉克政党代表的种族和宗教派别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与冲突, 政党发展的过程往往和政党武装的发展密切相关。不仅如此, 各政党为了扩大和稳固自己的势力, 还要利用和联军临时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 以及自己掌握的地方经济资源, 为其成员提供具体的物质利益。结果, 伊拉克战后政党政治发展的最大特点, 就是集政治、军事和经济行为于一体, 来维护和扩大不同种族和宗派的根本利益。

伊拉克政党政治的种族和宗派特色

在伊拉克战后的政治背景下, 伊拉克政党政治发展的基本特点, 主要体现为一场种族和宗派政治势力代理人之间的零和游戏。伊拉克国内长期存在的种族和宗教派别矛盾, 随着代表不同种族和宗派利益的政党政治发展, 进一步呈现严重的分裂倾向。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 “伊拉克未来的政治发展中, 国家政治权力将会更大程度地被代表不同种族和宗派的政治势力所控制。同时, 这些政治势力又会极力摆脱国家中央权力的约束, 并要求其成员对这些政治势力所属的宗派和种族保持忠诚”^①。这种情况意味着伊拉克的政党政治发展, 可能使种族主义和宗派势力进一步分化。事实表明, 伊拉克战后举行的各种全国和地方选举中, 党派之争主要取决于它所代表的种族和宗派的人口数量, 而无法上

^① Andreas Wimmer “Democracy and Ethno-religious Conflict in Iraq”, *Survival* 45 2003 p 124.

升为一种理性的政治程序。选举中的获胜者则根据所代表种族或宗派的最大利益来行使权力，而不可能为了全国利益而放弃派别的利益。这种政治过程造成的多数人专制，将使伊拉克长期以来的种族和宗派冲突难以消除。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伊拉克政党政治发展的基础主要是库尔德人、穆斯林什叶派和逊尼派。在伊拉克北方的库尔德人地区，居主导地位的是库尔德民主党和库尔德爱国联盟。作为民族主义的政党，他们有时也会发表一些代表整个伊拉克国家的政治理想宣言。但是，他们的政治利益和政治目标显然与伊拉克的阿拉伯人完全不同。他们的最高政治利益和目标，则是致力于维护库尔德人地区更大程度的自治，等等。在穆斯林什叶派占主导地位的伊拉克南部和西部地区，什叶派政治家们为了反抗萨达姆政权时代的逊尼派统治，很早就建立过一些什叶派伊斯兰政党。其中，主要有伊斯兰达瓦党（al-Da'wa）和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uncil for 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q）。另外，还有什叶派教士萨德尔（Muqtada al-Sadr）在萨达姆统治时期秘密建立的“萨德尔二世运动”（Sadr Movement）。伊拉克战争以前，这些政党的目标主要是推翻萨达姆政权，因而都受到了镇压，这些政党的领导者也大多流亡海外。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这些政党开始重新恢复。他们的政治目标主要是希望通过什叶派在人数上的优势，以民主选举方式控制伊拉克的国家政治权力。相比之下，逊尼派阿拉伯人在伊拉克战争后，几乎完全失去了他们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英国委任托管时期、伊拉克保皇党时期，以及1963年以后的伊拉克民族主义时期一直保持的统治地位，因而对伊拉克战后的政治新秩序极为不满。但为了维护他们仅有的利益，逊尼派一些政治家在战后政治重建中，也开始开展政党政治活动。目前，逊尼派主要政党是称为“伊拉克和谐阵线”的逊尼派政党联盟。2005年12月，该联盟在大选中赢得44个席位后，伊拉克和谐阵线领导人杜莱米（Adnan al-Dulaimi）表示，逊尼派愿和以前受它压制的什叶派共同组成政府。这种情况表明，逊尼派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伊拉克战后政治局势的现实，开始通过政党政治来重新建立萨达姆政权垮台后失去的政治势力。但这并不意味着逊尼派已经消除和什叶派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战后重建以来，两派激进势力之间的武装冲突愈演愈烈。

正是由于伊拉克政党政治所依赖的种族和宗派基础，由伊拉克政党政治发展带来了一种不断分裂化的倾向。导致此结果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伊拉克种族和宗派之间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难以调和的利益冲突。其中包括伊拉克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伊拉克什叶派阿拉伯人和逊尼派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另有逊尼派阿拉伯人统治伊拉克多年来和其他民族，以及宗派之间的怨恨。因此，那些论述政党特性的传统政治学观点在分析伊拉克当前政党政治时，往往很难解释伊拉克的政党特性与民众对政党忠诚之间的联系。根据伊拉克社会的历史，“民众在过去的年代中对宗派领导人表现出政治忠诚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现象，因为宗教派别在伊拉克社会生活中几乎从未起过政治代理人的作用”^①。如今，伊拉克政党政治的重要意义在于，政党已开始充当各个种族和宗派利益的政治代理人，并要求民众把原来对种族和宗派的热情与信念转变成对种族和宗派政党的政治忠诚。2003年4月伊拉克战争结束以来，伊拉克政党政治发展的背景中始终缺乏国家统一的中央政治权力和影响。因此，伊拉克政党政治的发展，只能作为不同种族和宗派追求政治权力的途径与扩大政治影响的方式。

政党政治发展与政党武装的联系

在伊拉克战后的政治重建中，为了扩大政治势力和维护本地区的地区安全，伊拉克各政党在发展过程中都积极扩展自己的武装力量。因此，建立民兵武装便成为伊拉克政党政治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在这些政党中，什叶派传统的激进派政党达瓦党，就是通过民兵武装占据和控制着纳什雷亚

^① Faizool Jabbār, *The Shi'ite Movement in Iraq*, London: Saqi, 2003, p. 67.

(Nasiriyya) 地区。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 则通过民兵武装组织巴德尔 (Badr) 旅控制贝库巴 (Baquba) 和库特 (Kut) 地区。同时, 其他各派政治组织, 也主要是通过各自的民兵武装占据势力范围内的城镇, 并控制这些地区的政治权力机构。

由于伊拉克战后社会生活缺乏秩序和稳定, 伊拉克各派政党的发展战略, 主要是通过民兵武装维护他们所在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当年那些流亡国外的政治家建立的政党, 跟随美英联军回到伊拉克后, 也积极致力于自建军事力量, 以维护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其中, 什叶派政党伊拉克国民大会 (INC) 回国后, 不但建立了自由伊拉克武装, 还和美国国防部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什叶派另一个政党伊拉克全国协议党 (NA), 也以自卫的名义建立了武装力量。

各派政治势力在通过民兵武装扩大势力范围的时候, 难免会出现相互间的敌对行动。其中最主要的, 自然是逊尼派和什叶派激进组织之间长期不断的武装冲突。2003年4月17日, 逊尼派萨德尔领导的激进组织把什叶派的巴德尔旅赶出了巴格达东部地区, 并把这个原称为萨达姆市的地区易名为萨德尔市。而什叶派萨德尔二世运动的武装组织, 也在库法、内杰夫和什叶派圣地撒马拉建立了据点。为了扩大势力范围, 萨德尔二世运动还成立了正式的伊拉克“救世主军” (Mahdi Army)。由于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对民兵武装冲突最初很少进行干预, 因而敌对政党的民兵组织在2003年后数月中的武装冲突不断加剧。

随着伊拉克政党之间的武装冲突加剧, 联军临时权力机构采取了一些措施加以制止。2003年5月23日, 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发布“第三号命令”, 禁止国家武装力量之外的其他民兵组织拥有重型武器, 且禁止个人在公共场所携带小型武器。不过这些禁令并不涉及处于联军监督下的武装组织, 也就是说不包括库尔德人政党的两个民兵组织。其中一个为库尔德民主党领导下的埃尔比勒 (Erbil) 和杜胡克 (Dohuk) 地区总督所属的民兵组织, 另一个是库尔德爱国联盟领导下的苏莱曼尼亚 (Sulaymaniyah) 地区总督和其他3个小总督所属的民兵组织。2003年6月, 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又明确宣布, 要解除什叶派巴德尔旅的武装, 并袭击了加底雷亚 (al-Jadiriya)、瓦西特 (Wasit) 和克特 (Kut) 等地区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的机构与武装组织。

面对伊拉克战后社会秩序难以维持的局面, 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后来改变了对待政党民兵武装的态度。2003年8月29日, 内杰夫的阿里 (Iman Ali) 清真寺爆炸案, 致使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领导人哈吉姆 (Muhammad Baqir al-Hakim) 和其他80人被杀。此事件发生后, 联军临时权力机构重新制定了伊拉克国内的安全政策。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原以为, 伊拉克的安全问题完全可由联军负责, 与各政党的民兵组织无关。爆炸事件发生后, 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发现, 联军实际上无法维持伊拉克国内的全面安全, 因而不得不依靠伊拉克各政党来解决安全真空问题。不久, 布雷默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提出, 民兵武装组织虽然不能单独承担维持安全的任务, 却能够在联军临时权力机构领导的安全结构中发挥作用。后来他还宣布, 内杰夫地区的民兵在维护当地安全的过程中, “和那里的联军具有同样充分的权力”^①。自此, 政党民兵武装开始在内杰夫和伊拉克南部其他地区正式承担起维持安全的任务, 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未变。^②

2003年底, 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在其建立的新的安全结构中, 不但继续发挥政党民兵武装的作用, 还使其进一步合法化。首先, 政党民兵的公开活动得到了联军临时权力机构的认可。2003年12月, 联军临时权力机构还修改了“第三号命令”, 规定民兵武装人员可以携带武器, 甚至包括重型武器。同时, 还取消了民兵武装要受到联军监督的规定, 允许民兵武装在得到授权后可以自由采取行动。尽

① Press briefings, 2 September 2003 and 6 September 2003.

② Se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Iraq: US Regime Change Efforts and Post-Saddam Governance*, Library of Congress Report RL31339, 7 January 2004, p. 12.

管此条例禁止在已有民间武装力量之外建立新的民兵组织，但同时也准许“根据联邦法律”在例外情况下不予禁止。^①其次，对于那些未经授权的民兵组织，联军临时权力机构也允许他们在民间继续发挥安全作用，参与维持地方秩序。结果，原被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取缔的巴德尔旅，也乘机改名为巴德尔组织，宣称自己今后将维护人道主义使命，并保留了1万名武装人员。联军临时权力机构虽不赞同巴德尔组织的这种做法，但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解散或是没收他们的武装。这表明，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已不得不承认，没有民兵组织的协助，现存警力根本无法维持伊拉克的社会秩序。尽管很多报道指称，“巴德尔组织经常攻击那些与萨达姆前政权有关的个人，但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对这些行动也大多是置若罔闻。”^②最后，伊拉克的政党民兵组织还不断和国家官方安全机构融合，成为政府武装人员的主要来源。2003年9月，过渡政府成立伊拉克国民防卫团（Iraq Civil Defence Corps）时，“不但招收了大量政党民兵组织成员，还让他们和联军采取联合军事行动”^③。另外，过渡政府同一时期还建立了保护服务机构（Facilities Protection Service），负责保护政府部长和官员的安全。实际上，伊拉克过渡政府中所有部长都处于政党的控制下。这使得民兵组织成员可以通过各政党控制的部门，转变为政府官员和国家安全部队成员。这不但使伊拉克政府部门具有政党武装派系的阴影，也使国家武装部队和政党武装间的关系常常难以区分。

政党政治发挥的社会功能

伊拉克政党在战后的发展过程中，还发挥了协助安排民众就业的重要社会作用。重建时期，伊拉克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大批萨达姆政权下的工作人员和军人，以及阿拉伯复兴党成员失去了工作机会，再加上普通民众也大量失业。在民众的就业问题上，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和伊拉克过渡政府所做的工作都有限。实际上，“无论是代表国家中央机构的伊拉克管理委员会，还是那些负责人道主义福利工作的国家机构，他们和伊拉克大多数民众间的联系其实都非常有限”^④。对于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联合国调查小组于2004年2月发表的有关伊拉克举行大选的可能性报告中曾有过详细介绍。这份调查报告指出：“大量迹象表明，伊拉克正在出现各种不同的政治派别。随着宗派主义势力的不断扩大，公共政治也日益多极化。其根源在于，政治过程依然被局限于有限的政治行为体，而且其可靠性也各不相同。在精英集团斗争的背后，是民众广泛的失业，而且特别是大量男青年失业。当前，很多人都表现出幻想的破灭和对现实的愤怒。”^⑤

与此同时，伊拉克各政党在扩大势力的过程中，都极其重视和广大民众之间的联系，并积极为其支持者们提供各种就业机会。首先，政党控制着大量的民兵武装，因而能够为其支持者们提供安全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机会。同时，政党还可以利用武装力量控制地方政府，并安排自己的支持者担任政府官员。不仅如此，各政党还和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安排的省长以及议员们保持密切关系，为自己和支持者争取更多的地方资源。尤其是，那些在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中拥有代表席位的政党，还可以在地方民众和联军临时权力机构之间充当职业中介。对于各政党来说，吸引更多成员扩大势力范围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伊拉克战后重建时期，工作机会主要来源于政府各种机构和外国企业。对于伊拉克国内几乎60%以上没有工作的成年劳动力来说，这些工作机会自然特别具有吸

① See Rajiv Chandrasekaran “Iraq’s Shiites Renew Call for Militias”, *Washington Post* March 4, 2004.

② Edward Wong “Iraqi Militias Resisting US Pressure to Disband”,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9, 2004.

③ Rajiv Chandrasekaran “US to Form Iraqi Paramilitary Forc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3, 2003.

④ Joshua Cole “The United States and Shiite Religious Factions in Post-Ba’athist Iraq”, *Middle East Journal*, Volume 57, 2003 p. 546.

⑤ United Nations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Iraq Report of Fact-finding Mission”, February 23, 2004 p. 4.

引力。“但要获得这些工作机会，必须首先得到一封与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关系密切的政党提供的推荐信。”^① 据悉，那些在地方管理和维护社会安全方面，与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密切合作并获得信任的政党，大多能够为其成员介绍工作。特别是“什叶派的伊斯兰政党，它签发的推荐信最为有效”^②。

对于希望加入过渡政府安全部队的人来说，政党提供的政治担保也至关重要。伊拉克战争结束后，被遣散的萨达姆时代的武装部队和情报机构人员，常常成为激进组织争取的对象。但他们大多还是希望通过政党的推荐重获正式工作机会。伊拉克国民大会，正是通过提供这种帮助而成功进行扩展的一个主要政党。伊拉克战后重建时期，伊拉克国民大会依靠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长期合作，逐步控制了伊拉克临管会下设的最高安全委员会，并在部长职位的分配中又控制了内政部。这种有利地位就“使得这个政党有了大量机会，为其支持者提供进入安全部门工作的机会”^③。因此，这个政党后来发展的成员，大多是伊拉克原来的安全机构官员。

除了安全部门外，那些曾在萨达姆政权机构中工作过的人员，也需获得政党的推荐，才能在就业市场中重获工作机会。根据2003年5月16日发布的“非阿拉伯复兴党”命令，凡是在阿拉伯复兴党内担任过四级以上职务，或是在萨达姆政权管理机构中担任过三级以上职务的复兴党成员，都不能担任政府公职。结果，“约3万多名原在萨达姆政权下工作，但不一定支持萨达姆政权意识形态的人，因此失去了职位”^④。战争结束后，这些人如果要重获工作机会，就须向联军临时权力机构提出申请。然而，审查这些申请的工作都交给了伊拉克临管会于2003年11月建立的“根除复兴党国家最高委员会”（HNCEBP）^⑤。在这个委员会及其分支机构中，各政党指定的人员不但有权直接决定申请人能否重新工作，而且可以安排他们担任地方理事会的成员。这就使很多伊拉克人，特别是那些希望进入社会上层的人士，都希望和已经进入伊拉克临管会的政党建立密切联系。在这些政党中，伊拉克国民议会最有影响力，因为它实际上控制着“根除复兴党国家最高委员会”。

在伊拉克战后的特殊环境中，政党在充当职业介绍者的同时，还常常通过和联军临时权力机构的关系，为国内外的承包商充当建设项目中介。2003年6月以来，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开始把大量建设项目合同提供给伊拉克临管会成员推荐的企业。例如“伊拉克为重建军队购买价值3.27亿美元军事装备的合同，被授予一个与沙拉比在商业上合伙的财团”^⑥。这种为那些与政党有关企业谋取合同的情况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非常普遍。因为政党也希望通过加强同那些向他们提供资助的公司之间的联系来获取政治活动的资金。在各政党中，伊拉克国民议会党不但控制了伊拉克临管会中经济和财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还负责指定财政和贸易部长，因而特别有利于获得国内外企业的支持。

政党政治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前景

总的来说，伊拉克战后重建，政党政治的发展，主要是在种族和宗派之间充满利益冲突，社会无安全稳定的环境，伊拉克临管会缺乏办事效率和能力，联军临时权力机构控制伊拉克战后的社会秩序和就业机会，再加上民兵武装广泛存在等一系列因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而形成了伊拉克政党政治的强烈的种族和宗派的特性。从理论层面说，伊拉克政党政治发展的结果，并没有体现出韦伯有关国家运作的“理性——合法性”模式。那就是政府官僚机构的高度效率、中央集权制、严格区分公共权力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界限。相反，由于政府、政党、部族和私人企业之间界限模糊，伊拉克政党

① Haifa Zangana “Why Iraqi Women are n’ t Complaining”, *Guardian*, February 19 2004.

② Roy M cCarthy, “How Freedom from Repression has brought Frustration and Fear”, *Guardian*, March 15, 2004.

③ Edward Wong “New Iraq Agency to Hunt Rebels”, *New York Times* 31 January 2004.

④ Haifa Hendarwi “Iraq Details Plans to Uproot Ba’athists”, *Associated Press* January 11 2004.

⑤ CPA Memo No 7, November 4, 2003

⑥ Knut Royce “Start-up Company with Connections”, *Newaday*, February 15 2004.

政治的性质更接近于新宗派的传统主义权力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伊拉克的政党政治发展,根本无法实现韦伯所要求的,那种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应建立在行政体系内,赞助人和委托人之间界限明确基础上的“理性——合法性”模式。^①

在伊拉克战后的政党政治发展中,政党不过是一种委托者构成的体系,而未能发挥政治发展推动者的作用。委托主义的特点即利用种族、部族和宗派的联系,一方面致力于实现政治委托者提出的要求,另一方面又扮演着责任担保者的角色。这种体系所强调的,首先是种族和宗派的原始忠诚,再加上经济联系的“粘合剂”,同时还需要建立一种稳定的社会关系。由于伊拉克战后软弱无能的国家机构无法满足民众的基本需要,于是政党便成为一个集种族与宗派需求、社会安全需求,以及个人经济需求为一体的特殊行为体。在这种情况下,要建立一个以现代政党为基础的民主体制,并且让选举人根据政党提出的相互竞争的政治纲领来做出选择,显然是不可能的。美国政府在鼓吹伊拉克战后重建中已经取得成功的民主转变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伊拉克政党政治发展的这种严重缺陷。这些鼓吹者并没有认识到,“伊拉克民主转变的前提,必须首先建设一种有效的‘政治文化’,并在国际机构的支持下建立起伊拉克的公民社会”^②。目前,伊拉克民主化最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于思想领域,因为很多伊拉克人并不反对民主的价值和内涵。而政党政治的畸形发展,则已成为伊拉克民主进程中的一个严重问题。事实上,在伊拉克的战后社会中,政党已演变成一种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的综合行为体。

事实表明,伊拉克战后政党政治发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和维护委托者的利益,而不是成为国家一体化政治发展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因此,民众通过政党体系来实现政治参与,必然会受到很大限制。同时,政治竞争既然是以种族和宗派利益为基础,自然也就无法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自从2003年4月政党体系在伊拉克开始建立以来,这种种族和宗派与政治之间的委托关系在地方政党政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而导致了国家在政治上的进一步分裂。结果,任何政党都不可能放弃各自在本地区的势力,因而也不可能去维护国家软弱无力的中央权力机构。对于库尔德人的政党来说,这一点表现得格外明显。实际上,《过渡行政法》在2004年3月开始实行后,库尔德人已经获得维持自治的保证。同时,代表各个种族和宗派的政党还通过《过渡行政法》巩固了他们在占领时期和过渡时期建立的地方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伊拉克未来的中央政府,作为一个听命于地方势力的弱势机构,只能在地区利益的冲突中担任调解者,而无法在伊拉克社会和政治发展中推行一种全国性战略。

伊拉克政党政治的畸形发展还意味着,伊拉克未来举行的各种公开选举,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各种政治势力按照种族和宗派的界线重新组合。《过渡行政法》实施以来,已经为这种政治势力的重组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在战争结束后联军占领的第一年中,伊拉克政治重建中政党政治这种离心倾向所起的作用,已经消除伊拉克未来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主导地方政治的可能性。对于那些指责萨达姆政权的人来说,伊拉克的各种政治问题,似乎都是当年阿拉伯复兴党为建立一个统一的伊拉克国家所造成的。因此,推翻萨达姆政权对于维护伊拉克种族和宗派的地方利益来说,自然会产生积极结果。然而,战后重建时期按照种族和宗派组合起来的地方政治势力,并不能代表伊拉克社会传统的一种复兴。作为战后政治环境发展的结果,伊拉克国家权力机构在政党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实际上表现得极其软弱无力。在畸形发展的政党政治面前,国家权力机构只能通过分解权力来维护自身的生存。然而,对于伊拉克国家的政治发展来说,这种降低民族国家权力的代价将极其昂贵,它将对伊拉克未来的国家建立和民主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责任编辑:徐拓 责任校对:安春英)

^① See Christopher Clapham eds *Private Patronage and Public Power: Political Clientelism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Printer, 1982.

^② Larry Diamond, “Universal Democracy”, *Policy Review*, No. 119, 2003.

Development of Iraq's Political Parties in Post-war Rebuilding

Wang Bo

pp. 5- 10

The Development of Iraq's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course of political rebuilding after the Iraq War reflects mainly in the enlarging conflicts between different races and religious parties.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 to "rebuilding the democratic country", all kinds of races and religious forces tries to establish political parties and enlarge their powers through elections. Because of the critical social condition, all political parties established their own military organi-

zations to maintain and protect their powers. These parties also provid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other advantages for their supporters. These triangle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politics, military and economy), are enlarging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races and religious parties and weakening the power of central government and will exert far-reaching influence in the futur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External Pressure of the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Yao Daxue & Ci Zhigang

pp. 17- 22

The motive force of the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originates i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external pressure in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The growth of internal structure meets the changes of national political tradi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role of the external pressure is to be

the creator and promoter of democracy. In the course of democrat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the external pressure should combine the internal force, so that can promote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therefore the consciousness of democracy will become more healthy and prospective.

Democratic Reform in Moslem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Sun Suyuan

pp. 23- 28

After the Cold War, the Moslem countries began to carry out democratic reform, for the reasons such as the internal demands and external pressure. Due to the different cognition and standard for democracy between the west countries and the Moslem countries, most of these Moslem countries didn't make considerable progress. The governments of the

Moslem countries are feeling great pressure from outside world, and trying to eliminate these differences. The prospect of the democratic reform in the Middle East is facing different possibilities for the contradictory demands coming from inside and outside world and the governments may have different choices.